

● 中华全景百卷书
道德礼仪系列

37

中华哲学精蕴

中华

向世陵

● 京华出版社



中华全景百卷书

○道德礼仪卷
○中华哲学精蕴

向世陵

京华出版社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 委 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 星

总编委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编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 红	王 伟
王 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 达	刘 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绶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 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绶祥

陆道中	武 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 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 时	空 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 昌	胡 洁	胡振宇	郝 旭	春 晖
钟 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 冶	浦善新
唐 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 超	葛晨虹	鲁 葳	焦国成	曾令真
谢 军	鄯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伸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帧设计：王 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任自斌 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徐庆全

主旋律的音符

(总 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在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 100 卷分 10 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 100 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 100 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 100 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 45 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目 录

引言	(1)
一、中国哲学源远流长	(11)
1. 先秦哲学	(13)
2. 汉唐哲学	(24)
3. 宋元明清哲学	(40)
二、中国哲学智慧集锦	(55)
1. 宇宙生成论	(55)
2. 本体论	(64)
3. 人性论	(75)
4. 认识论	(86)
5. 自由观	(95)

引 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华文明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中，诞生在被称作为赤县神州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在时代的前列，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这条宽广深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辈们创造了多姿多彩、绚丽壮观的优秀民族文化，而作为她的精神的概括和结晶的提炼的就是中国哲学。

但中国又只是世界的一方，我们概括中国哲学的精蕴离不开与产生于地球另一方的西方哲学的对比，这既是为便于明白和把握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为了回答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对中国哲学所提出的责难。

中国和西方的哲学产生于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它们虽大致都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但各自又有着不同的特色。中国奴隶制的发展并不充分，时间也相对短暂，当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哲学体系的时候，中国已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与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时期奠定了其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不同，中国哲学的成形是与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产生过程相伴随的。

西欧封建中世纪的姗姗来迟，带给西方人的是神学主宰一切和哲学的停滞倒退。而中国哲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却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其间虽也有过小的曲折，如西汉经学的神学化和隋唐佛学的兴盛，但中国的神学从来没有在整个社会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对神学（主要是佛学）的批判，是由封建阶级的思想家们以自我批判的形式来进行的，它大致在 12 世纪的北宋王朝时便已结束。西方哲学对神学的批判则是在四个世纪后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革命等形式来完成的，它反映的是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斗争。

在这以后，西方社会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和工业生产加速发展，机械力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结盟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因此而带上了机械论的色彩，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流

行。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西方的这段历史时，便提出是唯物主义将主观能动性让给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主观能动性。从而在西方哲学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对立，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绝对理念发展的辩证法的斗争。与此不同，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们都没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都是重辩证法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没有将主观能动性拱手让给唯心主义去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哲学学派的二分对立格局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严重和阵线分明。1840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的哲人们开始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哲学形态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变形，但双方仍有巨大的差距，不可能完全同一。中国哲学始终是受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矛盾制约和推动的，它反映和表现的是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特殊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我们也就不可能用一把简单的尺子来笼统地评价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同民族都有适应于自身的不同文化背景 and 不同社会需要的哲学思维形态，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但是，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中国哲学时，与西方一些学者的影响很大的观点便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其中在哲学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方近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明确表示中国、印度乃至整个东方都没有哲学和哲学史，可以说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他认为，“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在这里找不到哲学知识”。并从而断定：“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黑格尔作为一位哲学巨匠，为什么会得出如此的结论呢？他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东方是专制社会，人们的意志是有限的，不自由的；而思维、哲学是与自由同在的，意志是普遍的，无限的，它并不畏惧某一个“大力”（专制君主）。二是东方人主张自然与精神合一，主张天人一体。但这种合一不是统一，而是直接合一，是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于是，“实体（客体）与个体（主体）就漫无区别了”，“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天人合一）就出现了。”因而，黑格尔主张，真正的哲学应当是主体既在客体（对象）之中，与客体合一，但同时又保持其主体自身的特性，主体是自由的，普遍的，无限的。合一应当是真正的统一，我关于客体的知识、思想，同时就是我的知识、思想。（见《哲学史讲演录》第

95—99 页)

黑格尔对东方和中国思想的这些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惜他的批评及其结论本身,借用他的话,也是有限的、片面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中国古代虽然是专制的社会,但除了个别时期(如清代的“文字狱”)以外,通常仍容许思想的自由,重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春秋战国学术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儒、释、道三家之争和佛教各宗派之间的论争,宋代开始的新的百家争鸣等。就后者而论,仅《宋元学案》所著录的先后参加学术讨论的各学派的学者、门生和讲友就达几千人之多。正是他们的相互辩驳和自由讲论,才促成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和繁荣。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根本不可能想像有这么多各具特色的学派和学术思想的出现。皇权的专制并不直接限制学术思想的发展,除非这种学术思想直接危及到皇权的统治本身。但即使在此时,往往也只是醉翁之意,不过是借其学术观点、语词罗织罪名,作为打去陷害政治对手的借口而已,宋代的反道学斗争便是如此。

与此相应,认为专制制度下中国人的意志只具有有限的和恐惧的品格,应当说,这一面是存在的。自孔子以来流传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

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便是如此，它表明了中国儒家有以帝王意志为意志的思想的软弱的一面。但另一面同样是存在的，即儒家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此理想和目的而奋斗的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桓谭反讖纬的“非圣无法”，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以致牺牲了生命，范缜拒绝“卖论取官”，韩愈反佛教能做到“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王安石坚持传播新学、新法，敢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张载为创立治世救民的学术而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守仁宣称道为天下之公道，“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等等。这些思想家们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格可以说是极为宽广、无所畏惧的。他们为了创立、坚持和传播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惜丢官受难、甘冒杀头的危险。这里仅以后期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为例来略作说明。

朱熹是宋代理学道学一派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多次遭到指控和打击。在他的晚年，朝廷上下反道学之风日盛，终于于庆元二年（1196）发生了禁罢道学的“庆元党禁”，朱熹大弟子蔡元定被送道州编管，已丢了官的朱熹却率众学生为蔡元定饯行。两年后（1198），朝廷以道学为“逆党”，学者人

人自危，所谓“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宋史·朱熹传》）不仅是道学，连儒生也不敢以儒自命了。但即使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朱熹仍“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有人）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宋史·朱熹传》）一直坚持他的讲学著述活动。就是在他临终前，都还在修改集他一生心血的《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诚意》一章。可以说，即使在执政者以反道学为名行打击排斥异己之实的情况下，仍然不乏有像朱熹这样的敢于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学术主张的哲人。

其次，就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来说，黑格尔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懂天人合一的意蕴。中国古代哲人们所主张的天人合一，决不意味着主体（人）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而沉陷在客体（天）里，而是正相反，天人合一的命题本身，就是建立在主体的精神自由、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的。

孟子被人们视为最早提倡天人合一观念之人，因为他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著名公式。但这根本没有心（主体）淹没于天（客体）中之意。孟子所说的天，即仁义礼智的道德原则，它们构成为人的本性，二者本来是一致的。人只要能切实、充分地扩充人的良心（尽心），就能体验到内在的仁

义本性(知性);而一旦体验到内在的本性,也就同时把握到了天(知天)。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即宇宙万物的本性都在我心中得到体验,我与万物相通,故“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省体验而通于天道,是最大的快乐。那么,结论就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本身就是以主体的自由、普遍和无限性为前提的,是将自我提升到包容天地万物的高度,而决非将自身消解于天地万物之中。

北宋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以人为中心,批判改造了儒、释、道三家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将天人合一建立在虚与实的统一、实在与运动的结合、天道与人性的贯通、天、性、心有差别地同一的基础之上。它要求儒者通过长期积极有为的学习和修养活动,最终达到对天的体验和认识,并由此确立起内在的道德主体,走向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老而安死,然后不梦周公”(《张载集》第186页)的充分自由的境界的实现。因而,张载的天人合一讲的是心性的锻炼和精神境界的升华,赋予了人生以自由的充分实现的价值,这怎么能说是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呢?怎么能说是主体作为消极、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体之中了呢?可见黑格尔的结论实在是太武断了。

至于专制制度下有没有政治自由的问题，黑格尔也把这绝对化了。他所说的专制主要是奴隶制的专制，故普鲁士的“所有人皆自由”。其实，普鲁士当时的社会（1816年）仍然是专制（封建专制）的社会，资本主义刚刚开始生长，与我国明清时的社会状况差别不大。故要说没有自由（资本主义式）的话，都没有什么自由；或者反过来说，都有自由（封建主义式）。黑格尔的论据不实，他所作出的东方无哲学的结论也就只能是失之千里了。

当然，无论是黑格尔也好，还是后来的其他一些西方哲学大家也好，他们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偏见，主要还是出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感，故不愿意花费力气认真地研究中国和东方的哲学和文化。如欧洲现代著名的《哲学史教程》的作者、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便将“东方精神”视同于束缚个人创造性的同义语。他虽也承认东方的中国、印度等民族有某些哲学的“迹象”，也不缺乏对各门学科的丰富知识和关于宇宙的一般观点，但这些知识、观点或者受日常需要的限制，或者受神话的、宗教诗的控制，“都远离了自成完整体系的欧洲哲学的路线，因而一本教科书无须着手讨论。”（见《哲学史教程》（上）第38页）也就是说，与欧洲哲学不同的哲学发展道路即使存在，也

不具有在哲学史教科书里作一番“讨论”的价值，故可以不予理会。

因而，西方文化至上论或中心论明显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也给我们以揭示，即中西文化和哲学事实上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相对于西方哲学重逻辑分析、以精确性见长的特点，中国哲学则明显是重整体把握、重系统。后者不是像前者那样走的是一条“纯哲学”的道路，从“纯哲学”出发来批判和否定中国哲学，参照系的选择便已经失误。中国哲学总是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价值，更在于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比较恰当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治学宗旨。既如此，则世界文化和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向不等于中化，但也决不是西化，而只能是中西、东西的取长补短、融合交汇。承认西方中心或向西方看齐，从根本上缺乏历史的、文化的和科学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和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今天，更要注意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坚持中国的特色，以有益于我们正从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